

# 我与刘道玉校长

陈加宽

武汉大学依山傍水，风景宜人，我一生最重要的18年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两位长者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孙祥钟教授，另一位是蜚声中外教育界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授。刘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但我敬重他主要是他的知识分子的气节与良心、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改革家的气魄和情怀。

1965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专业是植物学。随后的10年文革，使我失去了在名牌大学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大学毕业后也无法从事我所热爱的专业。1979年，我有幸考取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植物学家孙祥钟教授，研究方向是植物分类学。1982年我获得了硕士学位，留校当了导师的助手。1983年又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1987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受教育的7年里，正是刘道玉校长领导母校进行重要改革的时期，我目睹了武汉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界迅速崛起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一位重要人物——

刘校长的历史功绩。当时我国大学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几乎大多是由武汉大学发起的。我作为一名学生，只能在远处看到风华正茂、叱咤风云而又十分儒雅的刘校长。当时，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上一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中的重要人物；70年代末主持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人，在大学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80年代初又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他是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是一位改革的英雄。

在我的记忆中，我是当了武汉大学教师后才与他相识的，后来有机会与他促膝谈心，记得起来的有几件小事：

1987年夏，我在老生物系门口遇到了匆匆走来的刘校长。他悄悄地告诉我，学校已决定让我担任生物系的副主任，要我一定好好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还告诫我千万不要荒废业务。两人的交谈仅仅只有两分钟，还没有等我反映过来，他已匆匆离去。当时，我拿到博士学位还不到半年，刘校长对我的安排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后来我才从导师那里知道刘校长为此与他长谈过一次，这是两位师长对我进一步培养的重要决定。我分管系里科研工作，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懂得了大学的基本结构单元——

系的功能和管理模式。回想起来，当时我最重要的收获是：明白了大学的管理者，只有掌握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从此，我开始热爱高等教育学，并将其作为我终身爱好之一。

当时我认为，在刘校长主持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我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可是，1988年春节前，学校里流传着校领导班子换届的消息，尤其是刘校长可能被免去职务的消息在全校快速流传，这无疑是对我的一击。很快要到春节了，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刘校长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他被就地免职。这是武汉大学文革结束后最大的一次动荡，干部、教师和学生有的愤慨，有的惋惜，少数人则暗喜。我又一次地看到人世间的百态。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们都预感到，1981年以来武汉大学在刘校长的主持下成为高教界改革先锋的历史将终止。我的导师在春节中，与我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才明白了这一结果是武汉大学自解放以来的派别斗争、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与省里长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一批青年教师，早已隐约感觉到刘校长与省里领导的分歧被校内外一股势力所利用。此时，大家已经意识到刘校长被免职是武汉大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损失，而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改革家失去了大学改革的舞台，也使其成为一位近乎是悲剧性的人物。

在刘校长被免职后不久，学校意欲任命我为研究生院副院长，我踌躇不定。一天晚上，我到刘校长家去咨询他的意见。他直言不讳地说：“加宽，你是大将之才，你的能力不止是担任个副院长，而是校长之才，其实我早就有意让你向这个方向发展。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不太赞成你出任这个职务。因为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搞好了成绩是别人的，搞不好板子打到你的屁股上，况且学校和省里的个别头头都不喜欢你率直的性格，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你应当做好现在的系主任，生命科学是大有作为的，等你建立了政绩，今后你可以到更高、更大的舞台上发挥其作用。”

虽然我认为刘校长分析得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于是我接受了对我的任命，结果在这个岗位上虚耽10年，少有作为。

在我刚刚熟悉研究生管理工作不到一年，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目睹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一次遭遇到的麻烦——刘校长的直言给他带来了灾难。当时刘校长在教育界和广大学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当局对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批判，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重大教育改革措施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却成了他的“罪状”。尤其滑稽的是，有两种人批判他让我无法理解：一种人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为了与刘校长划清界线，表现出了特别左的面孔，这些人随着他们以后的升迁而被师生们所鄙视；另一种人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作出姿态，但他们也未能受到宽恕和信任。

我的个性决定了我采取了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作法，连续6年带着全家在大年初一清早去给他和他的夫人刘高伟教授拜年。我记得天蒙蒙亮时分，许多校领导和教授门前拜年的人已络绎不绝，而过去门庭若市的刘校长家已是门可罗雀。我们敲开刘校长的门，只见他疲惫的身子斜躺在床上。他和他的夫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处在逆境时居然还有人不顾人们舆论，特意来拜年。实际上我是这样一个人，平时除了是导师家的常客外，几乎从来不到领导和权威教授家里去的。但是，我不顾好心的同事的提醒，连续6年给刘校长拜年。当时，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刘道玉校长是对武汉大学和中国大学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在武汉大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这所大学的耻辱，我要让大家知道还有一批人仍然很敬重我们的校长。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在学校作教育史方面的演讲，曾经多次表示我最崇拜的解放前的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大学校长是匡亚明和刘道玉。我的一些朋友为我的言论甚为担心，他们经常提醒我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对此，我从没有顾及，我是坦然的。

关于拜年一事的细节，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且我离开武汉大学也已8年了，但刘校长依然铭记在心，这使我很感动。

值得庆幸的是，刘校长有一位坚强而又高尚的夫人。在刘校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不但时时刻刻伴随其左右，而且为刘校长据理力争。在武大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她与刘校长走在一起的身影，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1990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一年，除了作植物分类学的专业研究以外，我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大量阅读了二战后美国大学发展的史料，发现美国迅速的崛起，除了地理原因使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受到重创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成为其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大学的改革，实际上大多是在中国推行美国早已实行的制度而已。我国大学教育史不过百年，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不断，大学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因此，我萌发了到美国教育科学院作博士后研究的念头。当时，我从美国打电话给刘校长，请他作我的推荐人，他很快把中英文的推荐信寄给我。他还带口信给我的夫人，要我好好地研究中美高等教育，回国后在从事大学领导与管理时是很有用的。我当时的动机主要是被美国充满活力的大学所吸引，很想借他山之石以指导我所管的研究生教育。后来，由于主观原因我没有如愿，尽管如此，我对中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使我受益良多。

在武汉大学期间，使我受锻炼最大的是我于1987年被推举为青年科协会长。这一青年教师组织是于1986年成立的，刘校长对此很支持，他还亲自到湖边食堂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当时，我正在作博士论文，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骆郁庭到我的实验室做我的工作，要我担任会长的职务，理由是我在青年教师中威信比较高，有组织和领导能力。最后我被说服了，出任了武汉大学青年科协会长。当时，青年科协非常活跃，有几百名成员，开展形式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出版了《珞珈青年丛书》和《青年科协会刊》，邀请校内学术泰斗和优秀青年教师作学术前沿报告，组织教师开展社会实践，探讨当时学术界重大事件和学术观点。比如，关于“超导体的重大进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特别令我难忘的是，经常组织青年教师与学校领导举行座谈会，使一些优秀的青年教师为学校领导所了解，为进一步启用他们创造了条件。例如，当时的一批青年骨干教师陈峰、王余光、骆郁庭、黄进、余劲松、马费成、郭齐勇、郭友好、邓晓芒等都是青年科协的积极分子，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武大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刘校长和郑永庭副书记，都十分信任青年科协，倾听我们的意见，解决了青年教师种种困难，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刘校长离职后，青年科协也渐渐地衰退了，据说后来校领导也想恢复，但终于没有成功。在我的经历中，担任青年科协会长这段时间，对我锻炼很大，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组织与协调能力。

在武大期间，还有两件事让我难于忘怀。1988年，我被推荐为湖北省人大代表。当时，我天真地认为，人大代表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反映民意。为了收集群众的意见，我在教工会定时接待来访

者，但想不到竟没有一个人来反映情况。当人大代表10年的经历，使我认识到只有不断完善人大代表制度，才能在老百姓中有地位。我记得80年代的人大会议，气氛是十分活跃的，在全体会议上可以自由发言，可以公开举手反对某个决议。当时，我就副省长候选人、三峡大坝建设和湖北省经济发展等问题，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会议期间，我还提出了湖北省人大历史上第一个质询案，在会议期间和舆论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现在我还保留着黄知真省长给我的亲笔信，他充分肯定了我的作用。因此，我两次被评为优秀人大代表，真正地起到一个人大代表应该起的作用。我感触最深的是，其实许多代表与我的看法相同，他们心里想的也是与老百姓相同，只是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公开表态而已。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人民代表，认真阅读文件，详细提出审议意见，无愧于人民投我的一票。为此，我也得罪了省里的某个大人物，他在一些场合点名地严厉批评我。我的这种处世态度，实际上是受了刘校长的影响。他为了武大的利益，敢于直言，顶撞了某位大官，因而导致了他1988年被免职。我深信，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另一件事，也许刘校长早已忘记了。我曾经得罪过他，可是刘校长对我们青年教师却很宽容。1985年，学校准备评审讲师职务，要求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教师考外语。我们一批住在湖边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师认为不公平，大家推举我带头向学校反映。于是，我与另外两位朋友组织了几十个人要求刘校长接见我们，在没有事先预约的情况下，我们这批冲动的青年教师涌进了行政大楼。刘校长马上从办公室出来接待我们，他劝说道：“加宽，你赶紧让大家回去，你们的要求我清楚，问题总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但你要注意反映意见的方式，你们这样做是无助于问题解决的，弄不好你们会犯错误的。”这事后来合理地得到了解决，也许刘校长已经把这事忘记了，但却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1997年，由于主客观原因，我离开了武汉大学。当时，刘校长已经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知道我的去意后，他与夫人一起到我家里看望我们。当时我没有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见我去意已决，他不再挽留，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决定，可惜的是武大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才。但对你个人来说，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复旦大学是你的母校，无论是她的学术地位或是研究条件，都在武大之上。因此，你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希望你作出重大的成就来，以实际行动回报母校。”

离开武汉大学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我提出调动的表面理由是父亲刚刚病逝，我得回上海为母亲尽孝道。实际上的原因是，我所热爱的专业在武汉大学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1997年，我所在的重点学科植物学得到国家教委的巨额资助，但是除了个别方向得到确保外，像植物分类学、植物细胞学、植物生理学等，却不被人所理睬。当时，我作了许多努力，向校、院两级领导作过反映，但是毫无结果。我彻底失望了。

在历史上，武汉大学是一所大师云集、治学严谨的名校。她培养出的许多学生，都成了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和科技界的杰出人才。在武大的18年，我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刘校长为武汉大学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执政的10年是武汉大学最辉煌的时期。他不属于他自己，他属于武汉大学。能否正确地对待这段历史，是武汉大学是否真正成熟的关键之一。我深爱武汉大学，留在我记忆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事是美好的，没有武汉大学决没有我今天。

我个人深受刘校长的影响，自觉地远离名利场；做事的原则是认真、诚信、有责任心；思想独立，决不人云亦云；要求自己做学问首先要会做人；培养出学生超过自己才算是合格的教师。

（陈加宽，1982和1987年先后获得武大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